

修辞学 专题研究

• 王培基 / 著 •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陕)新登字 004 号

修辞学专题研究

王培基 著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长安路南段 376 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陕教社照排室排版 陕西户县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5 印张 2 插页 382 千字

1994 年 5 月第 1 版 199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2,000

ISBN 7—5419—4709—1/C·4058

定价:12.00 元

序

我们与培基同志相识已有十年左右的历史了。十年中，见面叙谈，记得只有两次；鱼雁往来，却似未曾中断过。有时由于杂事繁忙，友人的许多信件一时来不及奉复，包括培基同志的信件在内，每当我们怀着歉意，思及信债未还之际，培基同志的下一封信往往又到了。他热情地谈及自己的近况，有时还寄来一篇新作。他的认真、执着，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也许就是我们多年来始终保持通信的一个重要原因吧。

数年前，他来信说，准备写一本修辞学专著，嘱为之序。我们虽然欣然允诺，但事情一忙，也就未曾时常询问书稿的进度。十多天前，当培基同志风尘仆仆地踏进我们的小客厅，把厚厚一大叠书稿放在桌上，腼腆地笑着，声称这是“三年辛劳的结晶”，希望我们为之评审，并表示将在沪坐等我们写序时，我们深为他的认真、执着精神所感动。

由于阅稿只能放在上班和开会之余，因此开始时只准备粗略地翻阅，但一展开书稿，即为一个个专题所吸引，欲罢不能。书稿中的十六个专题，偏重在修辞理论和修辞格方面，这些课题绝大多数是我们十年前撰写《修辞新论》时认真思考和探讨过的，因而读来倍感亲切。于是决定起早摸黑地突击，一口气于几天内读毕此书。掩卷沉思，想到了以下几点：

80年代迄今，我国修辞学之所以能走向繁荣，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与呈现了“理论的觉醒”有关。我们曾在一些文章中表明了这样的观点：“越来越多的中青年研究者认识到：理论是实践的指南，汉语修辞学要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必须发展理论思维，必须从理论上对一些根本问题作出解答。”历史已经雄辩地证明：

“是否重视理论建设，乃是修辞学能否顺利前进的关键问题。……时代急迫地召唤着修辞理论的开拓与创建，没有正确的理论，就不会有正确的实践！”^①正在我国修辞学迫切需要理论著作之际，培基同志的这本书脱稿了。此书如此重视修辞理论，对一系列基本理论问题进行探索，即使在探讨辞格时，也侧重于辞格定义及其美学、心理学基础等理论问题。它的问世，将对我国修辞学理论大厦的建设，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这是我们对此书第一个特点的评价。

第二，此书采取分专题探究的形式，既注意纵线的回顾，又重视横线的综述，纵横交错，史论结合，体例较新。在我国修辞学研究中，象此书这样集中这么多专题，在逐一“回顾”和总结的基础上，比较各家的看法，并提出自己见解的，似还比较少见。本书在研究的路子方面具有探新精神，为后来者提供了可资探索的足迹。

第三，此书材料搜集甚广，引例丰富。作者自己有一个统计：全书引自我国现当代修辞学专著的注释有178条；引自中国修辞学会所编论文集《修辞学论文集》（1—4集）及华东修辞学会所编论文集《修辞学研究》（1—5集）等专集的注释达263条；引自《修辞学习》杂志及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语言文字学》中有关论文的注达142条；引自美学及其他著作的注有113条。共计引注约696条。正如作者在《后记》中所说：“本书参考了有关论著，吸收了有关成果，凡是引用的都作了注，以表谢意。”由此亦可看出作者学风的严肃，态度的认真。由于全书建筑在大量材料的基础上，分析归纳时就左右逢源，较有说服力。

第四，该书既注重理论，又重视实用。它忠实地记录了现当代修辞学史上发生过的众多重要的争论，并且评介其中的得失，使读者在得知这些论争的源流的同时，还能知晓其产生的影响。同时，除全书列有“主要参考文献”外，每个专题的后面均附有一批“思考题”和“主要参考文献”。该书既可用作高等学校现代汉

语和修辞学专题课程的教材，又可供这方面的研究者参阅，适应面较广。唯其有使用价值，相信它出版后定会受到欢迎。

当然，正如作者自己所说，由于“身处高原，材料奇缺”，汇集有些资料“未能如愿”，因此某些较重要的论著、精辟的观点未被论及。希望今后千方百计地进一步“搜罗”，并作深入的理论研究。再者，以后如能继续进行专题探究，本书来不及探讨的一些课题，诸如篇章修辞、词句修辞、语体风格、修辞学史、作家作品的语言修改等等，都是很值得探索的。

我们坚信，凭着培基同志一贯执着追求、严肃认真地做学问的精神，当他下一回挟着青海高原的清风，不远千里再次光临寒舍时，定会带来更多的硕果。我们殷切地期待着。

宗廷虎 李金苓

1993. 4. 26. 于复旦园

①宗廷虎《汉语现代修辞学六十年》，见新加坡国立大学主编的《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即将由中华书局出版。

目 录

序	宗廷虎 李金苓
一、 “修辞”源流浅说	(1)
(一) “修辞”的古代解释	(1)
(二) “修辞”的现代解释	(7)
(三) “修辞立其诚”的“诚”的古今解释	(10)
(四) 近年来提出的质疑	(11)
(五) “辞”和“词”应当分用	(12)
二、 修辞学定义试析	(15)
(一) 现代的定义	(15)
(二) 当代的定义	(17)
(三) 定义凝结的成果及定义纷繁的原因	(22)
(四) 我们的定义	(24)
三、 试说修辞学的研究对象——修辞现象	(26)
(一) 修辞学的对象——修辞现象	(26)
(二) 修辞现象的特性	(37)
(三) 关于修辞学对象的争论	(50)
四、 简谈修辞学的研究范围	(58)
(一) 过狭论	(59)
(二) 过宽论	(66)
(三) 修辞学的研究范围	(68)
五、 简论修辞的基本原则	(71)
(一) 修辞要适应题旨	(73)
(二) 修辞要适应语境	(82)
(三) 关于修辞要适应语体的问题	(103)
(四) 题旨情境研究简史	(106)
六、 关于同义手段的几个问题	(135)

(一) 同义手段的性质和范围	(135)
(二) 同义手段的分类	(150)
(三) 关于同义手段的判定法	(153)
(四) 同义手段研究简史	(157)
七、辞格性质新探	(170)
(一) 代表性定义述评	(171)
(二) 辞格特性的再认识	(175)
(三) 修辞格与修辞方式、修辞手段、修辞方法	(189)
(四) 辞格与非辞格的界限	(192)
(五) 辞格与文学表现方法的联系和区分	(196)
八、关于辞格系统的比较研究	(201)
(一) 分类的目的、含义及方法	(201)
(二) 重要分类研究评析	(203)
(三) 关于辞格系统性的探讨	(220)
九、辞格心理基础简析	(229)
(一) 辞格的心理基础的含义	(229)
(二) 辞格心理基础研究的重要意义	(230)
(三) 辞格心理基础简析	(231)
十、辞格美学基础简析	(258)
(一) 辞格的美学基础的含义	(258)
(二) 辞格美学基础研究的重要意义	(259)
(三) 辞格美学基础简析	(261)
十一、纵谈消极修辞和积极修辞的研究	(292)
(一) 关于消极修辞和积极修辞的最初研究	(292)
(二) 陈望道的研究及其贡献和影响	(299)
(三) 五、六十年代的研究概况	(316)
(四) 新时期研究的新进展	(320)
十二、浅谈模糊语言及其运用	(348)
(一) 什么是模糊语言	(348)
(二) 语言的模糊性与准确性	(355)
(三) 模糊语言的运用	(361)

(四) 模糊并不等于含混	(366)
↓ 十三、试谈主要修辞学说	(369)
(一) 文辞修饰说	(369)
(二) 语辞调整说	(371)
(三) 同义形式选择说	(375)
(四) 言语形式组合说	(378)
十四、现当代重要修辞学体系综说	(383)
(一) 研究修辞学体系的意义	(383)
(二) 现代重要修辞学体系	(385)
(三) 当代重要修辞学体系	(394)
(四) 修辞学体系分歧的原因	(404)
(五) 应当重视并加强修辞教学体系的研究和讨论	(409)
十五、谈谈关于语法修辞结合的讨论	(413)
(一) 讨论缘起及其简况	(413)
(二) 讨论焦点之一——“语法修辞结合论”	(415)
(三) 讨论焦点之二——语法和修辞的“参合”	(426)
(四) 讨论涉及的其他问题	(430)
(五) 讨论的收获和经验	(433)
十六、修辞学研究方法总说	(435)
(一) 科学研究方法的涵义及特性	(435)
(二) 科学研究方法的系统结构及其作用	(438)
(三) 泛哲学方法	(443)
(四) 泛逻辑方法	(445)
(五) 泛研究方法	(454)
(六) 修辞学的特殊方法	(462)
(七) 关于运用研究方法的几点思考	(464)
后记	(470)

一、“修辞”源流浅说

“修辞”二字连用最早见于《易·乾卦·文言》：“子曰：‘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从此，历代学者对它作了种种解说，形成复杂的阐发系统。就此，作一番梳理工作，对于认识“修辞”一词的源流及其所反映的修辞观念，对于推进现代修辞学的继承和发展，不无裨益。

（一）“修辞”的古代解释

“修辞”的“修”字，东汉著名文字学家许慎的《说文解字》九篇上“彡部”说：“修，饰也。从彡，攸声。”它是个形声字，“彡”表意。再查《说文解字》“彡”：“毛饰画文也，象形，凡从彡之属皆从彡。”对此，清代著名文字学家段玉裁作了明确的注释：“修之从彡者，洒刷之也，藻绘之也。”可知“修饰”是“修”的本义。

随着词汇发展，“修”成为多义词。除“修饰”这条本义外，据《辞源》、《辞海》、《现代汉语词典》所解，还有修理、编写、学习、美好等义项。这些义项的用法，也散见于古代典籍。例如：

《左传·成公十四年》：“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汙，惩恶而劝善，非圣人谁能修之？”（着重号系笔者所加，下同）（《左传·成公十四年》）（“修”为“编撰”）

唐孔颖达说：“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者，辞谓文教，诚谓诚实也；外则修理文教，内则立其诚实，内外相成，则有功业可居，故云居业也。”（《十三经注疏·周易正

义》)

“君子之於学也，藏焉，修焉。”（《礼·学记》）
（“修”为“学习”）

“老冉冉其将至兮，恐修名之不立。”（《楚辞·屈原
离骚》）（“修”为“美好”“善”）

其中，“修饰”乃是常用义，特别是当它跟“辞”、“文”之类意思搭配连用时，一般以“修饰”义组合，以“修理”组合者极为罕见。例如：《论语》十四《宪问》篇说：“为命，裨谌草创之，世叔讨论之，行人子羽修饰之，东里子产润色之。”这里，不用“修”，直接用“修饰”，可见古代人对“修”的最初认识和运用。这里的“修饰”是目前所见到的文献资料中的最早用法。类似的使用法，较晚的如：东汉唯物主义哲学家王充说：“徒雕文饰辞，苟为华叶之文哉？”^①又如：明初文学家宋濂说：“身之不修而欲修其辞，心之不和而欲和其声，是击破缶而求合乎宫商，吹折苇而冀同乎有虞氏之箫韶也，决不可致矣。”^②这说明，从先秦开始“修”当“修饰”的解释和运用，是一贯的传统，它比较集中地反映了古代人“言之无文，行而不远”的朴素的修辞观念，比较客观地体现了古代人修饰写说的言语实践。显然，这种用法决不是引申用法。

“修辞”的“辞”的解释和用法，就比“修”复杂得多了。《说文解字》十四篇下“辛部”说：“辞，讼也。从𠂔，𠂔，犹理辜也。𠂔，理也。”《说文解字》同“辛”部说：“辜，臯也，从辛古声。”再查“臯”就是罪的意思。“理辜”即整理、分辨争讼之意。清代文字训诂学家朱骏声在《说文通训定声》中说：“按分争、辨讼谓之辞。”“辞”的这个意思在《辞源》中解释得更明确：“⊙

① 《论衡·自纪》。

② 《文说·赠王生黼》（《历代文论选》中册，第293页）

讼辞，口供。《书》《吕刑》：‘民之乱，罔不中听狱之两辞。’《周礼》《秋官》《乡士》：‘听其狱讼，查其辞。’……”这些都说明“辞”是一个会意字。“讼辞”、“口供”是“辞”的本义。既然是“讼辞”、“口供”，自然不会是个别的词。因此，由“讼辞”“口供”引申为成文之“辞”。先秦典籍采用此义的居多，比较熟悉的有：

辞多则史，少则不达。辞苟足以达，义之至也。
(《仪礼·聘礼记》)

不辞费。(《礼记》《曲礼篇》)

辞达而已矣。(《论语》十五《卫灵公》)

以上只是举例而已。先秦以后，更是不乏其例。这种言语现象，无可辩驳地说明“辞”若与“旨、情”等义组合，从源到流都指“成文之辞”，决非单个词儿。

南朝梁著名文学理论家刘勰在《文心雕龙·书记》中说：“辞者，舌端之文，通己于人。”南宋文学家文天祥也曾说：“辞之义有二：发于言则为言辞，发于文则为文辞。”^①这里，“言辞”即“语辞”，指口头语言，“文辞”指书面语言。“言辞”、“文辞”之说，完全符合历代运用“辞”的语言实际。例如：

辞尚体要，不惟好异。(《书经》)。(唐孔颖达疏：
“言辞尚其体实要约，当不惟好其奇异。”))

出辞气，斯远鄙倍矣。(《论语·泰伯》)(宋朱熹
《集注》说：“辞，言语；气，声气也；鄙，凡陋也；倍
与背同，谓背理也。”))

出言陈辞，身之得失，国之安危也。(《说苑·善说

^① 转引自郭绍虞《修辞剖析》载《修辞学研究》(第1辑)第16页。

篇》)。

辞非止于语言，今之文，古人所谓辞也。(宋·王应麟《困学纪闻·易》)

以上各书用例及其注疏，“辞”都指“言辞”，即“语辞”。

辞合于说。(《荀子·正名》)(注：“成文为辞。”)。

情欲，辞欲巧。(《礼记》三十二《表記》)。

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之，是为得之。如以辞而已矣，《云汉》之诗曰：‘周馀黎民，靡有孑遗。’信斯言也，是周无遗民也。”(《孟子·万章上》)

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此立文之本源也。(《文心雕龙·情采》)

以上各书用例及其注疏，“辞”都指“文辞”。有时“言辞”和“文辞”的分别，十分明显，可从多处找到直接采用“文辞”指称的用例，例如：

文辞之于言，又其精者也。(韩愈《送孟东野序》)

文辞，艺也；道德，实也。笃其实，而艺者书之。

(周敦颐《文辞·通行》)。

由此可见，“辞”不仅指“成文之辞”，有“言辞”、“文辞”之别，而且逐渐出现了分用的言语事实。同时，从翻阅的一些文献资料发现，在古代“文”、“言”、“辞”常有对举运用的现象。例如：

其旨远，其辞文，其言曲而中。(《易·系辞》)

徒雕文饰辞，苟为华叶之文哉？(王充《论衡·自

纪》)《言立一佳辞·曼》的表述面商该辞最为。这里“辞”和“言”、“文”和“辞”相错成文,这说明古人常把它们当作同义词语错综运用。

有的学者在谈到“文辞”、“言辞”时,也谈到了二者孰先孰后、谁轻谁重的问题。对于这类问题,我们认为,从前面讲述来看,“言辞”先于“文辞”无疑;“言辞”“文辞”的分合与轻重,大体上与汉语史中言文的分合与轻重相一致,至于更具体的史实,目前由于研究水平所限,恐怕难以阐明。

有的学者还谈到“辞”除上面讲到的“讼辞”、“文辞”外,还有命题、辞令、口才、才能、文教等解释^①,这些解释我们可以看作是“辞”的“成文之辞”的意义的直接引申,是“辞”的含义的一大词义系列,算是名词性系列,因为它们都跟“成文之辞”有直接联系,并且具有名词的用法。

“辞”的含义还有另外一大词义系列,算是动词性系列,这就是《辞源》、《辞海》、《中华大字典》上解释的“责让、告别、谦让”等,这些词义也都是“辞”的引申义。它们跟我们所讲的“修辞”的“辞”没有联系,这里勿需研讨。这里,有必要说明一点,所谓词义系列,只是粗略而言,并非词义引申线索的精确描述。

“修”和“辞”两字连用,古代人通常释为“修饰言辞、文辞”,这是个动宾词组。南宋文学家文天祥在《西涧书院·释菜讲义》中说:“修辞者,谨飭其辞也。辞之不可以妄发,则谨飭之故。修辞所以立其诚。诚即上面忠信字。‘居’有守之意。盖一辞之诚固是忠诚。以一辞之妄间之,则居之业顿隳,而德也随之矣。故自其一辞之修以至于无一辞之不修,则守之如一而无所作辍,乃

^① 见《修辞学研究》(第二辑),第120页;《修辞学习》1986年第4期第29页。

居业之义。”^①。这是他对前面引述的《易·乾卦·立言》的那段话的精要解说。从目前所掌握的材料看，这是具有总结性质的权威阐释。在这里，虽不言“修饰”，却比讲“修饰”更深一层，他强调了整个修辞过程“谨飭其辞”的诚实态度和严谨精神。这段阐释，曾被郭绍虞、濮侃等几位现代著名修辞学家多次引用^②。这说明文天祥既对“修辞”具有较深的认识，又对“修辞”的传统理解具有较强的概括性，因而具有代表性。古代人通常不仅这样理解“修辞”，还这样运用“修辞”。在南朝梁代著名文学理论家刘勰的《文心雕龙》中就至少采用过两次。一次在《宗经》篇中：“夫文以行立，行以文传，四教所先，符采相济。励德树声，莫不师圣，而建言修辞，鲜克宗经。”一次在《祝盟》篇中：“凡群言必华，而降神务实。修辞立诚，在于无愧。”这里“修辞立诚”的“修辞”是“修饰文辞”无疑。而“建言修辞”的“修辞”仍是“修饰文辞”，若当“修文”解释，就跟“建言”之意相重。著名古典文艺理论家周振甫先生的翻译就是有力的说明。他在翻译“修辞”时采用的仍然是“修辞”：“……可是作文修辞，却很少能够学习经书。”^③。

对于“修辞”两字最初的含义，现代许多著名学者也作了大致同古代相同的解释。有代表性的如郭绍虞、王希杰等。^④

新加坡的郑子瑜先生和我国的宗廷虎先生等都指出《易经》“修辞立其诚”的“修辞”的最初含义不是“修饰文辞”，而是“修理文教”。其根据都是唐代孔颖达疏：“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者，辞谓文教，诚谓诚实也；外则修理文教，内则立其诚实，内

① 《文山先生全集之十一》

② 《修辞剖析》载《修辞学研究》（第一辑）；《试论我国古代修辞研究的特点》载《修辞学研究》（第二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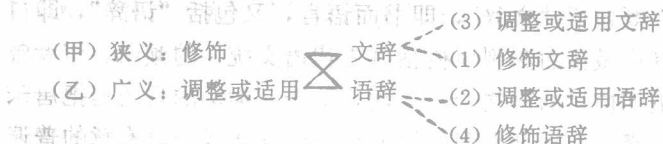
③ 《文心雕龙选译》（中华书局）第40页

④ 《修辞学研究》（第一辑）第7页《汉语修辞学》第4页

外相成，则有功业可居，故云居业也。”^①。这里提出了两个问题，值得讨论：一是“修辞”的最初含义究竟是什么？二是“修理文教”和“修饰文辞”怎样联系？如何演变？近年来，修辞学界对此展开了热烈讨论。讨论情况，下面跟有关问题一起讲述。

（二）“修辞”的现代解释

我国现代修辞学的奠基者陈望道先生的代表作《修辞学发凡》于1932年问世。该书是我国现代修辞学的奠基作，修辞学史上的重要里程碑。陈老在书中对“修辞”的解说也可以说是具有奠基的、重要里程碑性质的。他说，各家的解说，“大体上可分为广狭两义：（甲）狭义，以为修当作修饰解，辞当作文辞解，修辞就是修饰文辞；（乙）广义，以为修当作调整或适用解，辞当作语辞解，修辞就是调整或适用语词。两相交织，共得四种用法如下：



这四种用法，现在可说都是有人在那里用的，不过有意识的无意识的分别罢了。”^②。紧接着他对这四种说法作了分析和比较。对他的归纳和分析比较再作一番探讨，我们认为，其中也有继承性的研究，还有创造性的贡献。大体上讲，有下列几方面：

第一、言语事实的比较全面的概括。这里有两个概括：一是“把‘修辞’的‘修’解释为‘调整和运用’，既包括文采上的修饰，即‘积极修辞’；又包括质朴地调整语辞，即‘消极修辞’。”^③。

① 《中国修辞学史稿》第3页，《修辞新论》第3页

② 《修辞学发凡》1959年，上海文艺出版社，第3页

③ 宗廷虎等著《修辞新论》第3页

翻阅古代典籍，披沙拣金也不难发现古人对“调整”说的真知灼见。王充的《论衡·自记》中就有这样两句话：“或调辞以巧文，或辨伪以实事。”从中也可以看出古今渊源。在古今著作中，“调整语辞”的言语事实真可谓举不胜举。陈望道在《修辞学发凡·第四篇消极修辞》中举了大量的调整语辞的范例，其中关于黄犬奔马句法的工拙的讨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关于黄犬奔马句法的工拙问题的讨论，在我国的多种论文书中都有记载，许多大家都在抽象的发挥所谓工拙论，因而不得要领。陈望道从按着具体情况，分清宾主，从而调整语辞的理论高度一下说清了争论的症结，为一桩历史悠久的修辞悬案作了论断。如果把一切一切的言语活动中的“修饰语辞”现象和“调整语辞”现象，从出现频率、表达功效两方面加以相互比较，就会真正比出“修饰语辞”的“狭”。“调整语辞”之“广”。因此把“修辞”的“修”仅仅解释为“修饰”，离言语事实相差太远。二是把“修辞”的“辞”解释为“语辞”既包括“文辞”，即书面语言，又包括“语辞”，即口头语言，其中敏锐而深刻地概括着古代语文统一的倾向。作者曾积极参加五四前后的语文合一运动。这个“运动的目的是把唐宋以来无意流露的和局部发现的语文合一倾向化成一种有意的普遍的潮流”^①。这个白话文运动强有力地促进了话文合一的历史潮流，因而接近口语的白话文成为至今通用的公用语体。陈望道主张用“辞”统指一切书面的、口头的言语片段，是完全符合语文二流分合的客观发展规律的。

第二，理论上比较深刻的阐述。这里也有两点阐述：一是从修辞的特性和功效的理论高度，明确阐述或者说注入了“修辞”的“修”应该蕴含的内容。《修辞学发凡》中指出：“修辞原是达意传情的手段。主要为着意和情，修辞不过是调整语辞使达意传情能

^① 转引自杜高印《继承与创造的楷模》、《〈修辞学发凡〉与中国修辞学》第193页